

史学新论

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

——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

汪高鑫

【提要】在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古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从历史观入手对今文经学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进行批评，同时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并且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构筑古文学史学系统，最终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古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刘师培重视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批判旧史学叙述内容，提出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强调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史料观，对构建近代新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古文经学 史学近代化 章太炎 刘师培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2—0113—08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古文经学给予这种转向以极大的影响。^①一方面，古文经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孔子与儒家，打破孔子神圣权威，构筑起孔子历史之学系统，直接将古文经学改造成了史学；另一方面，古文经学普遍重视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进化论，以此作为对旧史学进行批判的武器和构建其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在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研究，直接将古文经学改造成了史学，在推动近代经学向史学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称“二叔”，^②与章太炎齐名的刘师培，则既是近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也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可比若为古文经学阵营中的夏曾佑。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新史学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旨

在前人偏重个案研究基础上，以章、刘二人经史之学为考察中心，对近代古文经学向新史学转向的整个嬗变过程作出论述。

一、章太炎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

章太炎早年治经特点是“杂采”今、古文的，究其原因，既有学术师承的因素，也与时

^① 本人曾发表《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一文（《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对何谓“史学近代化”，以及今文经学之于史学近代化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已经作过具体探讨。本文则集中探讨古文经学对于史学近代化的影响，实为前文的姊妹篇。

^② 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两人同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古文经学家。

代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从师承来讲，章太炎早年受学于俞樾，而俞樾的学术是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的，为晚清一代朴学大师，却又是一位思想开通的学者，并不一味地排斥今文经学。章太炎后来回忆其师说：“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①章太炎1890年就到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等经师学习，对俞樾的学术深为钦佩。前后8年的诂经精舍受学，奠定了章太炎扎实的古文经学基础，却也使早年章太炎对于今文经不但没有一种严格的区隔，反而多有采获。从政治因素来讲，戊戌变法前后，此时的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属今文学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的经学路数虽然与他们不同，而在政治上也是变法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政治立场与康、梁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与康、梁之间的学术难以做出明显区隔。

按照章太炎自己的说法，他是“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②的。这年是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亦即今文学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版之年。可能是看到《新学伪经考》之后，章太炎开始视今文经学为“诡诞”、“恣肆”^③了。不过，章太炎以1891年为自己经学学术旨趣的分水岭，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上直到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的经学还是古今畛域难分的。如1893年以前写成的被收于《诂经精舍课艺》的7篇读书札记，虽然是古文经的治学路数，却并未对今文加以排斥，甚至有调和古今的倾向；同为诂经精舍期间撰述的《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二书，有好几处都明显表现出章氏是赞成康有为等今文学家所大力宣扬的“孔子改制”说的；戊戌变法期间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就用了“大一统”、“通三统”等《春秋公羊》家言，以及喜言灾异的《齐诗》等今文经说；^④甚至1900年刊行的《脗言》初刻本，还明显存在着今文学痕迹，如其中的《公言》篇用“通三统”的观念来弥合今古文，《客帝》篇“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和《春秋繁露》”^⑤等。学界一般认为，

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开始由“革政”转到“革命”，而1900年7月与国会的“割辫与绝”，则“是章太炎投身革命的开始，是他和‘革政’决绝的表白。”^⑥随着政治观念的转变，章太炎的经学思想也发生转变，开始由古今畛域难分到专宗古文，从此开始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毫无顾忌地批评。

20世纪伊始，今文经学就已经开始向新史学转向了，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的发表，则标志着这种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然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今文学家所宣扬的循序渐进的进化史观，是为其实行国民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而此时已经完成经学思想转变的章太炎，其对于今文学的批评，自然也是从历史观入手的。1901年，章太炎撰写了一篇专门探讨治史方法的文章《征信论》，强调治史必须重视研究“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而不能用一种“成型”去改消历史，不能用社会学一般性结论去取代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不能强行去比附历史。^⑦学者认为《征信论》所表达的治史观点，“是对中国封建官方史学的否定，也是对康有为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的批评。”^⑧1902年，章太炎又针对梁启超的新史学构想及其政治用意，专门致书与其讨论历史写作的宗旨以及《中国通史》写作问题。书信所

①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2《俞先生传》，上海书店1992年版。

②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 称今文经学为“诡诞”、“恣肆”之语，载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④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1页。

⑤ 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⑥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1页。

⑦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1《征信论下》，上海书店1992年版。

⑧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反映的主旨思想，是强调通史撰述的意义：“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以纪传见之。”同时还表达了自己准备写一部百卷通史的愿望，并且具体开列了一个通史目录，包括五表、十二志、十记、八考纪、二十七别录。^①这个目录与后来的《诂言》修订本所附《中国通史目录》大致相同，后者应该是据此改定的。如果从历史编纂形式而言，应该说章太炎恪守传统典制纪传史体，当然没有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新史学章节体新颖和进步；如果从历史观来讲，二者都重视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如果从政治思想来讲，梁启超新史学主张的是一种渐变，是以进化到国民立宪政体为“今务”的，而章太炎则主张革命、剧变，重视“启导方来”。

1904年，章太炎的《诂言》重订本刊行。^②学者认为，与初刻本相比，《诂言》修订本不但反映了章太炎政治观念上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进程，^③而且“也反映了章氏经学观念上的激变，他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的基本倾向大体奠定，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独立的新古文经学基本观念也作了初步的规划。”^④毫无疑问，章氏《诂言》修订本的刊行，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古文经学向史学转化、或者说是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的重要标志。

首先，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诂言》修订本引述的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著作非常多，对于西方社会学有了更深的了解。章太炎早年曾接触过斯宾塞社会学，而斯宾塞是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倡导者，他的学说经过日本社会学的奠基者有贺长雄的宣传，在日本很有影响。章太炎通过对斯宾塞、有贺长雄等人社会学著作的研读，逐渐开始对他们的机械进化论倾向表示不满。而此时章氏又接触到美国社会学奠基人吉丁斯的社会学理论，赞成其宣扬的社会是通过“类群意识”而凝结和永存下去的说法，认为其说要优于斯宾塞。^⑤不过章太炎最推崇的还是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理论，认为岸本1900年出版的《社会学》，“实兼取

斯、葛（章氏将吉丁斯译为葛通哥斯——引者注）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⑥并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章太炎在日本期间，还广泛接触了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促使了章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从而认识到西方社会所存在的“贫富悬绝”问题，启发他对未来中国社会构建的思考。^⑦

其次，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从而铸古文经为史学。第一，针对今文学所谓“六经皆孔子所作”，而提出“六经非儒家所独擅”的观点。晚清今文学是极端尊孔的，康有为视孔子为儒家的创始人，认为六经乃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对此，章太炎明确表示不同的看法。早在1899年发表的辩诘廖平今文学的《今古文辨义》一文中，章氏就提出了“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⑧而在《诂言》修订本中，《清儒》篇则明确提出六经“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的观点；作为中国学术史论首篇的《订孔》篇更是具体阐述了孔子之与六经的关系：

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韬》

①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汤志钧：《从〈诂言〉的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文物》1975年第11期。

④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⑥ 章太炎：《社会学自序》，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⑦ 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⑧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金版》、《六韬》，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欲走，职矣。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道、墨诸子其实都是有闻于六经的，孔子只不过是删定六经罢了。

第二，针对今文学所谓以孔统儒、经儒合一论，而对儒学和经学作了区隔，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在《清儒》篇中，章太炎认为通行本《十三经》经儒不分，应该对它们作出区别。他赞成章学诚“六经皆史”论中的说法，认为“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像《十三经》中的“《孟子》故儒家，宜出”。而已被《七略》纳入六艺之一种的《孝经》和《论语》，也不能简单被视为经书，其证据是“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而“《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传《礼记》通论。”在《订孔》篇中，章太炎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于儒学之外，以孔子与道、墨诸子等量齐观；在儒学之内，认为孔子比不上孟子，更比不上荀子。他说：“《论语》者晦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又认为“荀卿学过孔子”。章太炎关于孔子、儒学与经学的言论，在当时今文学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然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它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返本复始的历史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儒分判的观念。”^①

第三，提出孔子乃“良史”说，构筑起古文学史学系统。视孔子为史家，乃古文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在《诂言》初刻本《独圣》篇中，章太炎就认为孔子“宪章其（指尧舜）业，以为六艺，使其道不至于遂逸，则犹史佚之于文、武也，亦庸能驾轶之乎？”^②将孔子作六经等同于史官所为。修订本《订孔》篇不但提出了孔子为“良史”说，而且还排出了古代史学的传承体系：“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璇玑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

歆。”这段话表达了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认为孔子是史家，《春秋》是史著，应该通过古文《左传》去了解《春秋》之学，这就不但对史书《春秋》的最初传承作了交代，而且确定了作为古文主要经典《左传》的地位；二是认为通过司马谈、迁父子撰述《史记》传承《左传》史学，而古文学的创始人刘歆继起撰《七略》，成为足以与孔子看齐的人物，由此确立了刘歆及其《七略》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史学传承当然少不了司马迁著《史记》这一环，所以章氏必须将其纳入系统之中；而对于司马迁《史记》的经学倾向，章氏在《春秋左传读》中作如是说：“史公极尊《左氏》，不治《公羊》。”^③我们且不说章氏的说法是否正确，不过他将《史记》划入《春秋》古学系统则是显然的。由此可以一言以蔽之，章氏是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构建起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史学的传承统绪的。而这样一来，一部古文经学的历史，也就成了一部史学发展史了。

第四，阐发“六经皆史”，提出“夷六艺于古史”论。章太炎推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而他的“夷六艺于古史”论又赋予了传统“六经皆史”说以新意。1904年刊行的《诂言》修订本，其中的《清儒》篇集中讨论了“六经皆史”论题。章太炎说：“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化”。接着，章氏援引日人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论述，将中国“六艺”与犹太《旧约》之《列王纪略》、《民数纪略》，日本忌部氏所掌古记录，以及印度的《鱼富兰那》等纪年书相比较，而得出“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的结论。针对清儒关于六艺之论，章太炎对清儒所谓“以经术明治乱”、“以阴阳断人事”、“以宗教蔽六艺”的做法明确加以反

① 刘巍：《从援今文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③ 《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对，认为这是“夸诞”、“怪妄”；而主张“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即是要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章太炎“夷六艺于古史”论的新意，其一是与章学诚视“六经”为“先王之政典”有区别。章太炎“夷六艺于古史”论的提出，显然是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六经乃上古三代之史。但是，章学诚视六经为先王政典，这种先王政典，当然是有德有位的人用以“纲维天下”的，自然就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而章太炎只是视六经为古代历史文献，这种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是用以了解历史文明进化与制度因革的。其二，章太炎视“六经皆史”说为古文家说。从学术史上看，人们并没有将“六经皆史”说当作古文家独有的学说，这显然是章氏一家之言，正如钱玄同所说的，“或谓‘《六经》皆史’系古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刘歆诸人何尝说过什么‘《六经》皆史’！为此说者，殆因章太炎师亦云‘《六经》皆史’之故。其实是今文学者的龚定庵与古文学者的章太炎师皆采用此章实斋之新说而已。”^①不过章太炎确实是将“六经皆史”说视为古文家言的，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重要思想，来对抗近代今文家宣扬的“孔子作六经以托古改制”说。章太炎甚至还以因为持“六经皆史”说的缘故，而认为“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②

二、刘师培对构建近代新史学的贡献

刘师培（1884—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刘师培出生于仪征的经学世家，自曾祖父刘文淇开始，至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均以治《左传》名闻一时，著有《左传旧注疏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刘寿曾整理该书，对古文经说也颇有研究，自撰有《左传历谱》。从小耳濡目染，以及传承祖业的愿望，促使刘师培走上了研治古文经学的道路。

刘师培持守古学、反对今学的经学观点，

集中反映在《汉代古文学辨诬》和《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二书的基本经学观点有：第一，对今文经学的古文伪经说进行了批判，肯定古文优、今文劣。刘师培反复论证了刘歆之前，古文经就早已与今文经并存，它们并非刘歆所伪造。而且还从版本和内容上进一步肯定古文经要优于今文经，并且具体提出了今文经劣于古文经的四种理据：一是晚出、二是荒诞、三是历经数世口传、四是说解分歧。^③换言之，即是说古文经的内容比起今文经要真实可靠。第二，对今文经学家的孔子改制说进行了批判。刘师培坚守古文家孔子之于六经“述而不作”的观点，认为“孔子以前久有六经，孔子之于六经也，述而不作”，^④并非孔子为改制而作。认为所谓孔子“素王”说、创法改制说，纯粹都是今文家附会之说；相反，孔子不但不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个守旧派，孔子自谓“吾从周”，故而“谓之改古制不可，谓之改周制犹不可。”^⑤然而，刘师培的学术志向是要做一个“通儒”，而不是“小儒”，因而他的经学研究既宗古文，又兼取今文之长，淡泊门户之见。他曾说：“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今文者，通儒之学也。”^⑥在他看来，古文虽优，也有其短；今文虽短，也有其长，应该兼收并取。^⑦

刘师培的历史观，深深地打上了其经学思想的印记，他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首先，刘师培作《攘书》、《中国民族志》和《读

① 《钱玄同文集》第4卷《〈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书首之“章太炎先生论订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

③④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左庵外集》卷4《汉代古文学辨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⑤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左庵外集》卷5《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群经大义相通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⑦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序》，《政艺通报》第23号（1905年）。

左礼记》等，具体阐发民族思想，旨在排满反满。《攘书》就说：“攘字即为攘夷之攘。”认为“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①在他看来，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区析华戎”都是它们的共同大义，如在《春秋》“三传”中，今文《公羊传》和《谷梁传》攘夷“粹言”尤多，而古文《左传》“亦首严华夷之界”。^②从经学发展史来看，西汉经学重视“辨别内外”，旨在“振大汉之天声，伸攘狄之大义。”^③宋元之世，先是宋代理学家“以古经有攘狄之义也，于是引伸之，光大之，上竞于朝，下争于野”，以“倡内夏外夷说”，接着是元朝“汉族守其遗训者，卒成明太祖光复之勋。”^④针对清朝满族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刘师培鼓动汉族复仇，而他复仇之说的出典，依然是儒家经说：“复仇之说，则今文、古文二家均持其义。今文《公羊》说有百十复仇之语，古文《周礼》说则以复仇之义不过五世，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立说虽殊，然私仇犹复，况于公仇。”由此得出结论：“故复仇以百世为限，满洲之仇不可忘；即以五世为限，满洲之仇亦不可不复。”^⑤

其次，刘师培从古经中揭示出中国古代所谓的民主思想，《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刘师培认为，早期君民关系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其中就蕴含着一种民主意识。他说：“上古初民，纷扰不可终日，宁乃相约公戴一人以长，之后遂有君主之名。”又说“国家者，由民人团体结合力而成者也。君为国立，无人民则无国家，此古今之通义，而万世不易之理也。”“一己之力，不足以去人人之国之害，遂以人人之力共去人人之国之害，其事半，其功倍，实天下之至便。是民约之成立，皆由于人民自利之谋。”^⑥这就是说，君主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其实都是人民的约定；而这种约定，有时是有利于人民自身利益的。只是后来随着君权的加强，阻止了人民的政议与进言，民约精神遭到了破坏。在此，刘师培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刘师培又认为，古代家庭伦理也体现了一种民主意识。他说：

“人与人相接，伦理以生”，并借用焦循语说：“与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恶推之于彼，彼亦以所欲所恶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让而不相争，相爱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⑦在刘师培看来，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致使早先家庭伦理民主意识遭到破坏，那都是君主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在此，刘师培已经意识到了家庭伦理民主意识之于国家社会伦理民主意识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希望重建一个理性和民主社会的愿望。

当然，刘师培在近代中国从古文经学转向新史学的过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莫过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该书撰述于1905年至1906年间，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为西周时期的历史。它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作之一，系统反映了刘师培的新史学思想。具体思想内涵分述如下：

第一，对中国旧史学叙述内容进行批判，提出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刘师培认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体现了重视君臣与事迹、忽视人民与典制的特点。指出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叙事主要涵盖了五个方面，即

①⑦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攘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读左礼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两汉学术发微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中国民族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⑤ 刘师培：《普告汉人》，《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⑥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中国民约精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①《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实践的，该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上古到西周的田制、官制、兵制、礼制、刑法、学术、风俗、学校、文字、商业、农器、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社会各方面的演化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总体上看，教科书既非单纯之政治史，亦非军事史，而近乎内容宽泛的殷周文明史。……视野之开阔，在晚清时期中国史教科书中首屈一指，理应给予高度评价。”^②

第二，强调要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刘师培堪称为汲取西学最迅速、最广泛的学者，大凡西方和日本有关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各种书籍，像西方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都普遍加以涉猎，并在所著各种书籍中广泛加以引用。《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运用西方社会学的进化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之作。在该书《凡例》中，刘师培明确指出：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③

这就是说，他要以西方社会进化的观点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典章制度的演变。《中国历史教科书》试图以甄克思《社会通论》关于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的一般描述，来具体勾勒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进化过程。该书将上古图腾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伏羲之世的渔猎时代、神农之世的游牧耕稼并行时

代、夏禹之世以耕稼为主的时代。并具体分析了图腾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耕稼时代以前的历史是母系社会，人们“知有母不知有父，血胤相续，咸以女不以男”；到了虞夏时代，“由女统易男统”，家族制度由此形成；伴随着家族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就出现了重视宗子的宗法制度和世袭制度，而“世袭制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体之起原也”，这种君主政体“萌芽于唐虞，至夏殷而渐备。”^④此外，教科书还对所涉及的上古至西周的官制、礼制、田制、兵制、商业、学校、文字、工艺、风俗、饮食、宫室等的进化历程都作了具体论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上古至西周社会全面进化的图景。

第三，提出了新史学的史料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参考和征引的史料非常丰富，按照刘师培本人的说法，“所采取书计数百种”。^⑤教科书征引的资料如此丰富，是与刘师培的新史料观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其新史料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分经史子集，皆广泛加以征引。在刘师培看来，旧史学以叙述王朝政治为中心，而新史学重视人民、社会、典制、民族的历史，这就要求新史学撰述必须重视发掘新史料，举凡经史子集，都应该加以征引。同时，作为宗古文经的史学家，刘师培本来就肯定“六经皆史”的说法，视孔子为史学家。正因此，刘师培能够充分认识到经史子集特别是经史的史料价值和考史功能，故而教科书在叙述西周历史时，“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多采三礼。”^⑥刘师培甚至关注到中国古代文献之外的各种文物的史料价值，他曾专门研究过古代的石刻和镂金，自觉地将古代各种文物作为史料来加以运用。其二是重

①③⑤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李洪岩、仲伟民：《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④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序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视参考和征引西人典籍。刘师培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①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中，刘师培便参考并征引了大量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著作，包括像甄克思的《社会通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日人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这些西人著作，直接影响了刘师培关于中国古史的史实解说与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从章太炎通过对近代今文经学历史观的批评，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及通过对孔子、儒家和六经及其

相互关系的梳理而构筑起的古文学史学系统，从而最终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到刘师培重视从古经中找寻民族、民主思想，进而通过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系统阐发其新史学基本思想，大致反映了近代古文经学向新史学转变的过程。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Ancient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Centering on Zhang Taiyan and Liu Shipai

Wang Gaoxin

Abstract: Modern ancient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ancient school scholar Zhang Taiyan criticized the subjective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and vulgar e practical concep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Simultaneously, he put stress on quoting various western sociology theories as argument basis of his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and historiography thought. Moreover, he constructed his history system of ancient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by summarizing Confucius, Confucianism,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ransformed the ancient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to historiography in the end. Ancient school scholar and Historian Liu Shipai taken seriously to find nationality and democratic conception needed by the time from “barbarians expelling” and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In his *textbook of china history*, he proposed the narrative object of new historiography by criticizing the old historiography’s narrative content, stressed that Evolution Theory should be treated as guiding ideology of history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 brief, he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new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ancient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Zhang Taiyan; Liu Shipai